

## 寄小学友书：中外、古今、成败 (Letter to a Young Scholar)

亲爱的小学友：

很高兴知道你被录取了，还有奖学金，可喜可贺。

很同意你的想法，两年拿了硕士，才决定下一步。

三十多年前，我也和你一样，一腔子热诚，满脑子憧憬。希望到先进的国家去，学人家的好东西，拿点回中国来。这样，我们也可以跟人家一样先进。三十多年的历程，体会了一点点。

到国外念规划的，都是研究生，在国内时都是名大学的高材生。到了外国，要适应新生活环境、新社会文化、新教育方式，甚至新的学科，实在是很吃力。人地生疏、举目无亲、同声同气的自然聚在一起。但规划是门社会性的学科，怎能关在家里、课堂里和图书馆里来念？这个问题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。很多同学们都能够突破中国人小圈子，结交外国同学、外国朋友。这倒不是我关心的问题。

万水千山到外国为什么？学“外国”的东西。在有社会性和实用性的城市规划学科里，这些东西是什么？是外国的城市现象、解释这些现象的理论、和处理这些现象的理论及政策。怎样去学？硕士学位选科弹性有限，关键在毕业论文。但也是最大挑战，尤其是找题目。西方特别看重独立思想，而且规划论文不像理工科论文，导师没有大项目或大实验室可以给您开个小题目，做个支节或细节的小研究。规划研究都是要去自创、自造。况且硕士是两年，过了第一年就要开始

筹划论文,压力很大。你将会发觉,第一年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上课、做作业,人家城市的真面目究竟是怎样的,才开始认识一些,人家的城市规划是怎样干的,才开始接触。什么是好的论文题目?茫茫然到哪里找?

很多同学们就会想,既然将来还要把学到的洋东西拿回中国,那就索性做个中国题目吧。而且自己对中国情况还有些了解,也有朋友、同学在国内可以帮忙拿些资料。中国题目实在是自己“比较优势”啊!最好是找个洋人认为是热门的中国题目,例如征地纠纷和城市扩散等,然后用上些洋理论例如公共参与去处理征地纠纷,精明增长去处理城市扩散,那岂不是更“洋为中用”?

论文开工了,做起来可不容易。在中国,征地纠纷的信访算不算参与,属 Arnstein 的“参与梯阶”(ladder of participation)的哪一节?把西方以民主为职业的非政府组织机制硬套进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去,行吗?在中国,城市扩散可不是因为为政者不聪明,不懂得环保与开发的冲突,不懂市场的作用,不懂利用基础设施发展模式去控制城市,而是他们非常清楚 GDP 增长才是政绩。城市扩散是经济增长的代价,但任期内看不出,可以不去管它。GDP 增长率看得见、摸得着,是职级考核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标准,那才重要。用洋人的“精明增长”去分析中国的升官窍门,能看出什么东西?!

以洋眼睛去看中国问题注定看不明。但是,论文还是要按时出货,才可以毕业。怎么办?有软硬两套。广东话叫“搏懵,搏同情”,是

软办法。“搏懵”就是利用洋老师不太熟悉中国，做假资料、假证据蒙混过关。“搏同情”就是利用洋老师可怜中国学生适应不易，“要是本地学生，断不放过，你是外来，放你一马吧”。你去的是一流学校，拿的是二流学位。就算不惭愧，也学不到什么。

我想多谈一点的是“硬功”。逻辑是这样子的。洋理论既是先进理论，错不了的；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，怎可以把功夫白费。如果中国的现象不能用这些理论去解释，那肯定是现象看错了；中国问题不能用上这些理论处理，那肯定是问题看错了。洋理论怎会错，不用改；要改的是中国的现象、中国的问题。这逻辑说出来很可笑，但实际上我们（洋人和中国人）往往跌落了陷阱而不自觉。

这是个可怕的陷阱，永不超生。它使我们在不自觉中改变中国的现实去迁就西方的理论。规划理论绝大部分是指导性的理论（而非一般自然科学的解释性理论），也就是，它们是有伦理的。拿以上的两个例子来说，洋理论认为公共参与和精明增长本身就是好事，所有规划应以它们为指导思想。可是我们要明白洋理论是来自他们的文化（包括政治、经济和社会）。洋文化产出洋理论。除非中国全部接受洋文化，怎能样板式地把洋理论引用到中国。

可是，有人会辩说，我们用洋理论，都是经过修改、过滤的，怎可以说是照搬？我想，这些修改和过滤往往在表面，不在本质，是换汤不换药。就拿上面两个例子。在西方，公共参与是为了处理人民（包括企业）与人民，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；精明增长是为了处理

环保者与开发者之间的利益竞争。基本的假设是个人、个体（包括政府）之间的利益有实质的不同，又互相不能相让。那么，争是无可避免的。但也无妨。只要这些私利和私利之争是按着民主原则（人人参与）和市场原则（公平竞争）来进行，“无形之手”就会保证得出来的结果是最高的公益、最合理的分配。

西方的文化里，公益产生于私利的竞争，是千万个小我利益的综合，扎根于小我的肯定。中国文化里，公益是大我的利益，扎根于小我的超越。肯定小我与超越小我来自两种不同的文化。文化不同，处理问题的思路也有别。这是基本性的东西，不容动摇、不易改变。所谓“硬功”，就是独尊西方的思路为金科玉律。那就只好否定中国的文化——先是以西方的理论去批判中国的现象，进而批判这些现象底下的中国文化。

你要认清洋老师批评中国没有真民主、没有真竞争（市场），是因为在他的文化里，小我的理念遮盖一切。为了保护和满足小我才事事要参与、样样要讲公平。不然，小我就得吃亏了。渐渐地，参与和公平从工具变成理想，变成真理。但是，在你的文化里，先哲给了你大我的理想。在大我的世界观底下，我为人人是责任，人人为我是期望。要维持责任与期望的平衡，也许需要参与和公平作为工具，但我们的心态和这些工具的作用就跟洋人的不同了。

中、西文化的一个基本分别是对人性的评价：中国比较乐观，西方比较悲观。这造成了大我与小我，人治与法治之别。在西方，远有

柏拉图，近有邱吉尔，他们都认为明君比民主好，但他们也认识到最好的明君可以变最劣的暴君。这实在使人不放心，退而求其次，行民主吧，也就是以法制去约束人性。为此，西方政治哲学把民主叫做“次好”（second best）。中国的孔、孟思想，生于春秋战国的乱世，理应是对人性没有信心的。但孔、孟的伟大就是在人性有善有恶的认识底下，提倡仁政，以道德去教化人。因此，有性善、民贵之说。西方文化选择了“抑恶”，中国文化选择了“扬善”。

其实，法制也好，教化也好，都是以互律来维持社会的稳定。不同者是西方依赖小我与小我的互相监督；参与和公平就是有效监督的先决条件。中国相信大我是小我的超越。我不知道参与和公平是不是超越小我的先决条件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它们决不会是逐私利的参与和擂台式的公平。我希望会是为善不甘后人的参与，扶贫救苦的公平。

有人会说，这些都是理想的东西，不是现实，也不会实现。我不同意。理想是极重要的，它给我们方向，方向决定我们的命运。西方的小我、法治方向是在“文艺复兴期”重新发现、“启蒙运动”期上路。当初的理想是今时的现实。中世纪的西方人怎会想到他们的现实会消失？当代的中国人怎知他们的理想将来不会实现？其实，谁都有理想，只不过许多人没有自己的理想，只懂追求人家的或俗世的理想罢了。理想不是一件东西，是一种追求。追求就是实现。

有人会说，大我、小我，人治、法治，在中国和西方都不是绝对的。这观察没有很大的意义。当然，在西方不是没有大我、人治的观

念，在中国，更不是没有对小我和法治的向往。而且，无可否认地，小我是经济发展不可缺的动力，法治是警恶惩奸不可无的工具。但关键在“比重”。就像一个天平，两边相等才有平衡。而且是动态的。那一边多放一根羽毛就向那一边倾斜。起初是慢慢的，越来越快，越来越不易扭转。不要说，多一点、小一点有什么的问题。问题大得很。你的炮射程 10 里，人家的炮射程 11 里。胜负之算不是 10 与 11 之比，你将会全军尽没。现今，小我不只是多一点。现今是小我当道，绝对需要大我去平衡。

其实，小我、大我都是人的天性。但小我性强，白痴也懂，无需鼓励。大我性弱，需要栽培。大我，在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中的生存空间很小。你看，英语（英语世界观代表了西方）的“我”字是唯一的大写的字。“你”和“他”都是小写。他们没有“大我”这名词，只有“我们”，也是小写。“我们”不是“大我”。中国人上台演讲，说声“大家好！”洋人上台演讲，只说“女士们、先生们！”礼貌十足，但绝无人气。如果他说“我们好！”那是失礼。“大家好”就不同；我、你都包括在内。这个“家”字更是暖洋洋。当然“家”是不平等的，有上下之分，长幼之序。但也包含了责任和期望、服从与爱护。这些是洋人听不入耳的。因此，在洋理论中自然找不到肯定大我的世界观，更找不到在这个世界观里什么才是解决征地纷争、约束城市扩散的好办法。

更重要的是，小我世界是不能持续的。私利挂帅的世界里，你可以发财，但不会安宁，因为人家也要发你的财。每个人不安宁，社会

怎会安宁？环境的破坏更是无可避免，因为环境不是私产，谁去保护？大我的世界观才是出路。如果环境是“大家好”的事，在“大家好”的世界观里，岂容忽视？在小我与大我的天平上，为世界的未来，要多放点大我。如果中国不去干，世界还有什么希望？北京奥运会的口号“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梦想”动人之处就是在这个“同一个”的大我理想。

那么，是不是小我就没有价值？这个问题问错了。你还记得我曾跟你说过犹太古哲这话，“如果我不为自己，谁来为我？但是，如果我只为自己，我是什么东西？”问题不在大我与小我的价值孰轻孰重，而在它们的和谐共处。这，怎样去研究？你当然听过“一目了然”这话。为什么我们还是有两只眼睛？两只眼睛就是两个不同的视觉；这创造出视差；视差使我们看出立体。你一定玩过这游戏。闭上一只眼睛，尝试把线穿过针孔，难极了。因为单一一只眼睛看不出深度。看世界也是如此。要同时从小我和大我的角度去看，才是真人看真世界。凡理论都利用单线逻辑，只有一只眼，它使你看得清，但看不全。这是理论性东西的强处和弱处。也是搞理论的人的最大挑战。无懈可击的逻辑，透彻精细的演绎，怎可能会错？不是错，是不全。有时，看不全比看不清要危险。它给你一目了然的错觉，但你实在未窥全豹。看不清，你会小心；看不全，你倒会大意。“清”是技术性的东西，如摄影的曝光、焦距。“全”是艺术性的东西，如取景、构图。“清”与“全”是构成“真”的两个层面，既分开，也相连。如果你想看得清楚些，用逻辑；如果你想看得全面些，用想象。要留意，逻辑使你

有信心但容易变得刚愎自用，想象要你有虚心但容易变得优柔寡断。

我知道，“洋为中用”是你出来求学的用意，但我希望你先多了解“洋为洋用”，然后才决定“中用”。在研究“洋用”中要特别留意洋现象和洋理论之间的关系。这个理论是否真的能够解释这个现象，真的能够支持这个政策？它是来从哪一个角度去观察，哪一个层面上去分析？更重要的是，这个理论是怎样跑出来的，它的社会、经济、政治背景是什么？只有这样，才能够认清洋东西的真面貌，才可以考虑“中用”。

你或者会问，如果洋东西不合中国用，为什么还要去学？用有多种。洋东西不可以做样板，但可以做借镜（看清自己）、启发（打开思路）和教训（避入歧途）。这些，你要认真研究。

很多研究“洋为中用”学者、专家，特别是研究有关软科技如经济规划和管理的，往往会在观察和推理上有两个失准。第一，他们把研究范围放在“现在”：就是研究西方先进国家的现行政策、结构和模式去找其可用之处。这是个“方法”上的错误。先撇开“西方国家是否先进？”这个难于定性的问题不说，现行的政策、结构和模式的作用和影响一定要到将来才有分晓。因此，不可能做科学性的研究，也就是说，只可以臆测，不能做因果分析。如果西方国家的先进不是出于意外或偶然，它们现在的成就只可能来自过往的耕耘。因此，值得研究和可以研究的是“过往”的政策、结构和模式，及其演变。过往的每一个政策、结构或模式就好像一个实验。实验结束，成败分晓，



才可以追索成败的因素，和分析这些因素与成败之间的因果关系。

第二，他们把研究焦点放在“成功”：就是研究西方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去找其可用之理。这个是“着眼”上的偏差。一个政策、结构或模式的成功是相对于它的目的、成本和正/负影响。我们是否跟西方国家追求同样的目的，拥有同等的本钱，和可以承受同样的正/负影响？不然，就只能羡慕人家的成功，不得模仿。其实，许多所谓“成功”只是我们想当然。举例，我们要模仿人家发展小汽车，人家正为小汽车头痛；我们要模仿人家城市化，人家正要控制城市化。当然，有人会说，西方国家发达了，才装模作样说小汽车太多，城市化太速。也有人会说：小汽车、城市化是发展必经过程，发展高潮过后自然会有适度调整。前者是小人之心，不是针对解决自己的问题，只是假想人家的心亏。人家的有识之士对小汽车和城市化早就担忧，只是发展已定形，骑虎难下而已。后者是无知或遁词。如果小汽车和城市化的负面影响可以调理，人家早就做了，还等什么。其实，研究它们“不成功”之处更有收益；为什么当初不能推测小汽车会带来问题，为什么现今不能控制小汽车的泛滥？为什么当初未曾注意到城市化会带来的压力，为什么现今不能调节城市的扩散？成功的条件往往是独特的，不能抄袭；失败的原因却往往是共通的，可供参考。

两年的硕士，肯定不够时间去研究这么多和这么深。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，放在研究“洋为洋用”上吧。你更要跳出书本，从“想当然”跑到“是当然”。报纸、杂志固然要看，闹市、坊间更要多走。洋人朋友要多交，但不要单选择同行或同道的；要多谈，但不要单谈

事业或学问。十多年来，我也为中国培训了多批国土和资源管理的干部。他们都是年青人。在加拿大的5个月，我安排每人到一个政府机构或企业做见习。我要他们深入加拿大社会。除了注意当地新闻和与房东、同事打交道以外，每人还要单独访问三个社会组织，例如学校、医院、教会、养老院、退伍军人俱乐部，等等。你也不妨试试。

最后，我希望你不要取洋名。方便外国人是好事，但也不必要。你试从他们的角度去想想。如果他们与你是平等相交，怎会要你改名去迁就他们？如果你坚持，他们当然只好“恭敬不如从命”。父母给你的名字多么有意义。你要向洋朋友解释它的意义。这才是朋友的亲切，这才是真的友谊。历史文化比较浅的民族，如非洲、南美，会用洋名，但多是教名，不是长大后再改的。古老民族，如日本、印度，绝无改洋名的。就算南洋诸国，如马来西亚、印尼等，都是用父母给他们的名字。只有中国，特别是香港，是例外。这种“洋为中用”，免了吧！

这两年你将会忙透了。但得益会受用终身。因为你将懂得怎样去评价洋东西。

祝你

学程愉快，丰盛人生！

老学友

梁鹤年加拿大女王大学

2007年4月